

· 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 ·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王立新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距今约 8000—5000 年间, 辽西区史前社会由最初分散的村落组织, 到出现部落, 再到出现酋邦, 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之所以如此, 主要应归因于该地区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口迅猛增长。红山文化晚期, 正值辽西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顶峰阶段, 但超限度的人口密度以及高强度的粗放式农业生产, 使得该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难负重荷。加之距今 5000 年前后出现的降温事件, 最终使得人口大批迁离, 酋邦社会解体, 史前社会重新开始以较低层次的组织来维持运转。

[关键词] 辽西区; 史前社会; 社会发展进程

[中图分类号] K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34(2005)02-01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1JAZD780003)

[收稿日期] 2004-02-27

[作者简介] 王立新 (1966—), 男, 陕西铜川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所说的辽西区, 是考古学上文化区的概念。早在 1977 年, 张忠培先生在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授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时, 就明确提出战国以前的辽西区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1991 年, 张先生在《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一文中, 进一步对该区的地理范围进行了界定, 指出该区“是指医巫闾山以西, 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 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1]。就目前认识, 这一区域内已确认的史前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它们应当属于前后相继的单一文化序列^①。从文化内涵上看, 这四支文化相互之间的一些主要文化成分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 从文化谱系上说, 它们大体应属同一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自兴隆洼文化至小河沿文化, 作为一个单一文化迭相更替且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考古文化区, 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演进过程? 导致或影响这一社会进程的动力是什么? 是东北史前考古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① 这是参考以往众多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自身在辽西区近十多年工作中的体会而得出的一种综合性的认识。至于过去在涉及辽西区的考古文章中经常被提及的富河文化, 据目前的调查和分析看, 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的中上游地区, 它与东北方向的嫩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较多的相似性, 有可能属于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就其年代来看, 该文化大体与赵宝沟文化并行。参见朱延平《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近年, 伴随辽西区一系列史前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区域性考古调查的蓬勃展开以及多学科分析手段在实际工作中的介入, 已为上述问题的解答积累了颇为丰富的资料。本文即拟在综合分析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认识的基础上, 对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作一尝试性探索。

—

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据碳 14 测定, 大致在公元前 6200—前 5400 年之间。[2] 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布局大体有两种。第一种以敖汉兴隆洼 [3—5]、克什克腾南台子 [6] 和阜新查海 [7—8] 聚落为代表。特点是几乎所有居住性遗迹皆相互毗连, 集中在地形起伏不大的同一区域之内。从分期的角度看, 处于兴隆洼文化偏早阶段的南台子和兴隆洼一期聚落, 居住区外都有椭圆形的围沟。沟内房屋皆成排分布, 整齐划一, 体现了建筑过程中的统一规划和设计。南台子聚落共发现房址 33 座, 最大的一间房子位于居住区中心偏北。兴隆洼一期聚落所包含的房屋数尚不确定, 但规模可以肯定要大于南台子聚落。这里最大的两间房屋并排坐落于居住区的中心部位, 面积各达 140 多平方米。这两处聚落都呈现了一种以大房子为中心的凝聚式布局。按照以往对仰韶聚落的分析, 似可推测它们各自代表了一个以血缘关系相维系的氏族公社。需加说明的是, 两聚落的围沟既窄且浅, 宽深均仅 1 米上下, 与后来的城壕不可同日而语。所以, 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公共的防御性设施, 倒不如说是一种界沟, 借以强调整个聚落的统一精神。

查海三期聚落大体属兴隆洼文化的偏晚阶段。聚落内的房屋集结为若干个房屋组, 每组 2—4 座, 组内的房屋大多仍遵循着排列成行的习惯。而从整个聚落看房屋已不再有统一分排的现象。聚落内房屋由统一分排到出现若干房屋组, 似乎意味着氏族内部血缘纽带的维系力开始减弱, 而按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进一步区分的“小集体”的地位正在逐渐得到重视。据介绍, 兴隆洼聚落的偏晚阶段, 亦出现了类似现象。可见, 至少从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开始, 类似查海这样的聚落已可区分为聚落—房屋组—单个房屋三级结构。综合各方面现象, 可以认为以房屋组为代表的人群此时已成为村落中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依组内房间的可居住空间判断, 这种规模的人群少则七八人, 多则十数人, 很可能是包含三代人左右的一个大家庭, 或称家族。单个房间虽然也都发现有灶, 并常伴随日常的生产与生活用具出土, 但从整个聚落内少见单个房屋独立成组的现象看, 以单个房间为代表的人群在经济上未必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尽管此时聚落内的人群已按血缘上的亲疏关系趋于分化并体现于房屋布局中, 但就整个聚落来说, 凝聚性却并未因此而丧失。在查海, 由若干房屋组所围绕的一个 500 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 发现一处长 19.2 米的龙形堆石, 其南侧又分布有 10 座墓葬和 2 座内存烧灰和猪骨的祭祀坑。这片遗迹的规模虽小, 作用却有可能已类似于年代略晚的半坡文化村落中心的广场, 属于整个村落举行公共性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9] 况且, 此时这片居住区的外围仍有界沟的环绕。

在林西白音长汗 [10] 和敖汉兴隆沟 [11] 遗址, 看到的则是兴隆洼文化聚落内部布局的另一种形式: 聚落由彼此分开的 2—3 个区或地点组成。这些区由于彼此紧邻而仍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白音长汗遗址属同一时期的聚落被分为南北两区, 各自都有围沟标界。两区之间约有 40 米的开阔地带相隔。北区发现有房址 29 座, 呈 4 排分布。南区规模与北区大体相若。两区相距甚近却以围沟严格界分, 透露出彼此所居人群在血缘关系上的疏远。这大概代表了两个因联姻或其他需要结邻而居的氏族公社。兴隆沟聚落则可明确区分成东、中、西三区, 彼此亦有空白地带相隔。如果说这里每区各能代表一个氏族公社的话, 那么整个聚落的人群就很可能属于包括了三个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性质不大明确, 或可称之为氏族联合体。由于白音长汗和兴隆沟聚落的年代大体都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或稍晚阶段, 因而, 这种高于氏族公社一级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时间, 当不晚于兴隆洼文化的中期。

在近年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对赤峰西部地区所进行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中, 在 765.4 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共发现兴隆洼文化的遗址 14 处 [12]，遗址点的分布稀疏且较为均匀。这些遗址点有的单独一处，有的则三两个在彼此相距很近的距离内结伴，相互之间只有几十米的空白地带或自然沟壑相隔，而整个范围的长度均不超过 1 公里，以至于各个地点的社团成员能够很容易地进行日常的面对面交流或从事共同的事业。这种“毗邻而居”的若干遗址点在以往我国学者所从事的调查中一般是作为同一个遗址来记录的，其中的各个地点则往往被视为遗址中的不同分区。前述白音长汗和兴隆沟遗址即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若按我们传统上对遗址的判定标准，合并若干毗邻而居的“遗址点”之后，调查区内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实际要少于 14 处。

结合已发掘的几处遗址看，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在规模上虽有差异，所对应的社会组织在层次上又各有不同，但从空间分布和内部结构看，并未表现出中心聚落出现的任何迹象。

凡保存较好的兴隆洼文化的房址，内部多数只有日常生活必需的日用陶器和工具。房屋的形制、结构与陈设也都十分相似。个别房址在所处位置、规模或出土遗物上与其他房屋有所不同。如查海聚落中的 F46 位于聚落北部居中位置，是聚落内最大的一座房址，面积约 120 平方米，房内出土了一对特大型石铲，较之一般石铲大 1 倍有余，刃部无使用痕迹。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特殊用具，同时也是此屋主人地位的象征。又如白音长汗 F19 该房址位置并不居中，规模也并非最大，多数出土物与其他房屋无甚区别，但室内居住面中央栽立一石雕女神像，显示了此屋在功能上的特殊性。[13]

兴隆洼文化的墓葬存在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将死者埋于室内，见于兴隆洼、兴隆沟与查海三地。第二种为中心广场墓葬，见于查海。第三种即一般墓葬，分布于居住区之外，见于兴隆洼、白音长汗和巴林右旗的锡本包楞 [14] 等地点。前两种墓葬均有特殊性，埋葬的原因及墓主人的身份都不甚清楚。其中部分室内墓葬的死者随葬有玉块、玉匕形器及蚌饰、牙饰等较精致的物品。兴隆洼 M118 居室墓葬主甚至与两头整猪同穴并列埋葬，可能反映了死者的身份地位与众不同。[15] 白音长汗聚落附近的坡顶上有一处小型墓地，居山顶中心部位的 M5 为长方形石板墓，地表有石砌围圈，其余墓皆土坑竖穴式，地表有积石。M5 被盗，其余墓葬多见个人的小件装饰品，仅个别墓葬随葬有陶器。推测 M5 墓主人的地位可能要较其他诸墓为高。以上现象反映当时社会已有初步的阶层分化，但不同阶层在居住和埋葬待遇上的差距并不十分悬殊。所以，这一时期可视为古代社会正由较早阶段的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

此外，与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风格类似的实物还见于林西西门外 [16] 等兴隆洼文化遗址，说明女神崇拜已不是单个聚落中的偶然现象，可能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

赵宝沟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5200—前 4200 年之间。[17] 该文化已开始接收到来自中原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比较精致的泥质陶器。在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中，共登记有含赵宝沟文化陶片的遗址 29 处，数量高于兴隆洼文化 1 倍。遗址点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这一时期仍旧有一些独立一处的遗址点，但由几个遗址点相聚成群的现象较为多见。即使按毗邻而居即属同一聚落的原则合并了若干个遗址点之后，仍有 2—3 处遗址相聚成群的现象。群内的遗址相距近者约数百米，远者可达 1 公里以上。这种遗址群的出现，表明该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按照前文我们关于聚落遗址所对应的社会组织是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推论，那么这种遗址群所代表的显然应是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人类学材料相对比，似可将这些由邻近聚落中的人群所构成的小范围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对应于部落这一层级。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规模不等，甚至同一聚落内不同居住地点的规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敖汉赵宝沟聚落 [17] 的面积约 9 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该文化聚落中规模较大的一处。居住地可分两区，中间有浅凹地带相隔。从对第一区的发掘来看，聚落内部房屋的分布特点与兴隆洼文化偏

晚阶段相似，往往 2—4 座房屋聚为一组，组内房屋多按同一方向排布。有时几组这样的房屋倒似沿坡岗上的同一等高线形成一排，但就整个聚落来说，已不存在统一分排的规律。在整个聚落中，房屋组才是最引人注目的单元。生活于其中的家族，构成了社区中相对独立的，恐怕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此时位居第一区中央的仍是一所大房子（F₉），面积近 100 平方米。房屋倒塌堆积中出土有大量遗物，仅可供饮食的钵碗类器皿即有 37 件，占所清理的 17 座房屋出土全部饮食器的近 1/3。可见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日常起居之处，也当是赵宝沟聚落中一处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除此大房子之外，聚落东部有一处以石块垒砌的圆角方形的平台状遗迹也颇为重要。发掘者推测，这可能是该聚落的一处公共的祭祀性建筑。大房子和石砌建筑的存在，标志着聚落的统一精神依然坚固。

类似于赵宝沟聚落 F₉ 那样的大型房屋和居住区附近祭坛性质的石砌建筑，目前还不见于其他地点的报道。赵宝沟聚落是否已构成了附近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心性聚落，限于对比资料的匮乏，尚不得而知。

由于缺乏墓地的揭露，使得分析赵宝沟文化的阶层分化受到一定限制。不过，可反映社会分层的迹象在若干聚落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敖汉赵宝沟》一书的作者依据房屋的规模、形制、建筑技术及出土遗物的差别将聚落内已清理的 17 座房屋分为由高及低的四个等级，以此来表现房屋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不过，由于所分过细，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实际上非常微弱。小山遗址 F₂ 是研究赵宝沟文化的学者们经常要提到的一个重要遗迹。[18] 该房址出土遗物在居住面上的分布，显示出房内已有男女两性劳作空间的分割。[19] 出于男性一侧的一件石钺，制作精巧无比，当是权力的象征；一件陶尊的腹部竟刻画有环绕器身的成组神秘化动物纹。可辨其形者有肋生双翅的鹿、躯体盘卷如蛇的猪和一只似鹰非鹰的怪鸟。图案之抽象令人惊异。由此一斑，足可窥见当时人们精神活动的复杂。类似的神鹿形象也见于赵宝沟和敖汉南台地 [20] 聚落出土的陶尊之上，反映出对此类灵物形象的创作和表现，在较大的范围中已遵循着相同的程式。所以，拥有这种特殊陶器和石钺的房屋男主人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该聚落中首领级的人物。但须强调的是，与这些高级别遗物同出的毕竟还有石核和大量石片，这是制作石器的遗留。显然，这一“尊贵”的人物并未脱离普通的劳动。这一事实似乎表明，赵宝沟文化的聚落中虽有成员之间的等级地位之分，但更多的应是表现在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方面，未必达到经济或政治地位不平等的地步。而且，较之社会关系更为复杂的等级社会来说，此时尚未达到全社会划分为若干不同阶层的程度。而这些，正是部落社会所具有的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位于赵宝沟文化分布区边缘的滦平后台子遗址中，曾发现 6 件石质女性雕像。[21] 看来，女神崇拜仍然是这一区域中人们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接下来的是红山文化。该文化的绝对年代可推定在公元前 4200 年—前 3000 年间。它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较之赵宝沟文化阶段更为紧密。这一时期，遗址的分布密度陡增。前述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共发现含红山文化陶片的遗址点 160 处，比赵宝沟文化阶段的遗址点数量多了数倍。按照周南 (Robert D. Drenan) 教授的看法，这 160 处遗址点实际上可归并为 125 个“村落”级的遗址。而其中大约半数的“村落”遗址在空间上可聚合为 13 个较大的群体。不仅如此，分布于调查区域东南部的其中 6 个群体，由于彼此相距较近，相互之间似乎又集结为一个更高层次的群体。[22]

以往敖汉旗的文物普查也已揭示出了类似的现象。据邵国田先生介绍，该旗范围内红山文化遗址点的结群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每群包含 3—5 个遗址点，多者可达 20 余个遗址点。而以河谷为纽带，若干遗址群又聚集成更高层次的群体。旗内大约可分出 6 个这样的群体。这种规模的群

体所占据的地域面积均在数百平方公里以上，所包括的遗址群的数量多少不等。牯牛河上源的这种群体包括了 11 个遗址群，分布于大约 700 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内。〔23〕其分布密度与在赤峰西部调查中所看到的情形大体相同。这种地跨数百平方公里的遗址群体的出现较之赵宝沟文化阶段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如果说聚落群这一小范围的地域性社团确对应于部落一级的社会组织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占地更广的遗址群体的出现或许表明若干地域邻近的部落已经以某种形式结合成了一种部落联合体。

敖汉旗的调查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遗址已明确出现大中小三级结构，面积较小的遗址多为 4 000—5 000 平方米，中型遗址多在 3—10 万平方米，而大型遗址面积可达 2—3 平方公里。一个遗址群往往由一个大型或中型遗址为中心，周围则是若干较小的遗址，表明遗址群中已出现中心聚落与从属性聚落的对立现象。

位于牯牛河上源丘陵山地中的西台遗址群，共包含 12 个遗址点。位居中心的西台遗址设有两个相连的围沟，平面恰好形成一个“凸”字形的轮廓。其中东南侧的围沟周长 600 多米，现宽约 2 米，最深处 2.25 米，当有一定的防御功能。〔24〕这种设防的中心性聚落或许已具备了后来方国都邑的某些功能。

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遗址是一个经较大规模发掘的普通性聚落。〔25〕在 3 215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共发现红山文化房址 15 座、灰坑 171 座。遗迹显得比较稀疏。房屋有的三两座聚为一组，有的则单独一处，分布上已无成行排列的现象。这一布局显示出家族一级的社会组织仍是稳定的经济单位，而有的家庭在经济上或许也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变化可能表明氏族公有制经济成分有所削弱，而私有制经济成分正逐步得到强化。

已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大多以积石冢的形式出现。常见的墓地一般规模较小，多位于某一处遗址附近的山冈上。墓葬少则几座，多则数十座集中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结构形式与兴隆洼文化山岗墓地（如白音长汗）所见一脉相承。已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6〕、林西白音长汗〔10〕、阜新胡头沟〔26〕、巴林右旗洪格力图〔27〕等地点都有发现。据称，敖汉旗最南端的四家子镇也发现了 3 处积石冢墓地。〔23〕上述墓地大体都是就近选址，且与某一聚落存在对应关系的普通墓地。

地处辽宁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规模庞大的墓地群兼祭祀中心。已发现的 20 余处遗址点，集中分布于 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已编号的 16 个地点中，有 13 个地点都有积石冢。这些积石冢分布于牛河梁一带绵延的丘岗之上。一般一岗一冢，也有一岗双冢和一岗多冢的情况，而每冢中墓葬数量多少不等，多者一冢可达数十座墓。每冢中央都有 1—2 个规模较大、地位显赫的墓葬。除积石冢外，另外的几个地点都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其中，位于牛河梁主梁顶部的女神庙及其北侧经人工修整的大型山台，显然是整个遗址群的重心所在。多年的工作和研究表明，牛河梁遗址群当初的建设无疑是经过了严密的统筹规划和设计，从而将墓地群与几处重要的祭祀场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与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28〕调查发现，在这片墓地群与相关祭祀址所在的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已不见任何世俗的居住性遗址。

种种迹象显示，牛河梁遗址群选址之刻意、规划之严密、规模之宏大、内涵之复杂已远非前述普通墓地所可比拟。它并非某一部落、更非某一氏族所能拥有，至少应是周围方圆数百平方公里范围之内的人群所共同经营的一处“圣地”。它的存在，与前文对遗址分布的分析一样，同样表明红山文化中业已产生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

与赵宝沟文化阶段相比，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明显是一种飞跃。其显著标志即是出现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部落之间的联合体。但是，这种部落联合体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却是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在关于红山文化社会性质的诸多看法中，当以苏秉琦先生的主张最具影响。他认为，出现了

坛、庙、冢的红山文化后期，已率先跨入了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即“古国”阶段 [29]，而且由此可将中华文明起源模式中的“原生型”文明的出现上溯至距今 5000 年前。 [30]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其中有些学者即主张将红山社会看作是前国家阶段的一种复杂社会的形态。我在《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一文中，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分析，曾将红山文化这种超部落社会组织的一些突出特征概括为如下几点：（1）流行以女神崇拜为中心的多神崇拜；（2）出现了权力阶层；（3）权力阶层内部有等级之分；（4）高阶层的管理权主要是通过“通神”权的控制而获得的；（5）丧葬礼与祭礼已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拙文又进一步提出，红山文化的部落联合体虽然在一些方面已经接近了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但是，两种社会之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红山文化的女神庙不同于三代社会以男性祖先为本位的宗庙。（2）牛河梁遗址群中的各积石冢地点乃至各冢本身都有相对的独立性，表明以积石冢中心大墓墓主人为代表的最高阶层系来自联合体中的不同社团，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将中心大墓的墓主人视为王者，那便同三代社会各代之王出于同宗，显具本质的不同。况且，迄今仍无迹象证明整个部落联合体中已出现权力高度集中的王者。（3）牛河梁遗址群所反映的丧葬礼与祭礼虽已初具三代社会同类制度的一般性特征，但该遗址群以神庙为中心的整体布局、墓葬间以通神之玉以别等级的做法，均体现了这两种制度以神权为核心的特点。与三代社会以王权为核心、王权高于神权且规范性较强的成熟礼制相比，尚有很大不同。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红山文化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距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它应当属于一种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 [31]

若将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与西方人类学界所描述的酋邦社会相比，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确实已具备了酋邦社会的最根本特点即社会分层。 [32] 它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权力阶层的内部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人类学和考古学界对于酋邦社会的研究较之塞维斯（E. R. Service）等人的开创性阶段已有许多重要的进展。 [33] 例如，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伦佛儒（Colin Renfrew）发现酋邦社会存在以团体为本位和以个人为本位的两种社会类型 [34]，厄勒（Timothy K. Earle）等人则提出酋邦制本身的发展过程又可分为简单酋邦社会和复杂酋邦社会阶段 [35]。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红山文化社会的发展无疑会有很大帮助。从牛河梁遗址群的分析来看，该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似乎很接近以团体为本位的酋邦社会。集中表现在联合体有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共同修筑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最高阶层由来自联合体内的各个群体的成员共同组成等方面。另一方面，中心大墓墓主人在冢内一人独尊的现象，表明他对所在的群体曾经有过最高的管理权，然而放眼整个部落联合体，他又可能只是更上一层决策机构中的一员而已，况且地位也未必与其他群体中的最高人物完全相匹。而这种管理层中的两级决策机构，正是衡量上述复杂酋邦社会的一个最实质性的标准。所以，我认为，至少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已是酋邦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它虽然处于前国家阶段，但距国家出现已并不遥远。

四

自红山文化之后兴起的小河沿文化，处于辽西区以筒形罐为代表的文化系统的衰落阶段。对于它的年代，可参考红山文化的下限年代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年代将其估计在公元前 3000—前 2200 年之间。该文化除继承当地红山文化的因素之外，还吸收有庙子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成分。通过对赤峰西部的区域性调查了解到，小河沿文化的遗址数量较之红山文化时期骤减，仅发现 36 处，与赵宝沟文化遗址的数量比较接近。遗址在分布上比较疏散，部分遗址有三

五成群的现象，但已不见集结为更高层次遗址组群的现象。大多数遗址面积较小，都在数千平方米左右，较大者也很少超过2万平方米。遗址地表暴露的陶片等遗物数量也很少，与红山文化相比，形成鲜明反差。因此，调查者推测小河沿文化时期人口指数大幅降低。

以小河沿文化堆积为主的遗址至今未经过大面积的揭露。因此，人们对该文化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尚缺乏深入地了解。从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 [36] 等遗址的发掘来看，该文化的房址主要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且规模很小，多在10平方米左右。在房址的形状、结构与规模方面与本地区此前诸文化相比有很大变化。此期单个房址的周围都散布有大小不等的灰坑，有的当是窖穴。经全面揭露的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地 [37]，对了解该文化聚落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有一定帮助。此处墓地共发现77座墓葬，可分4个小区^①。每区之内分若干首尾对应、排列齐整的行。墓地、区、行当代表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行中的墓葬有双人合葬的现象，其中有明确为男女合葬者。这可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家庭一级的社会组织或许已成为相对稳定、独立的社会单元。在这批墓葬中，有的墓随葬有成套的生产工具（斧、锛、凿、骨梗石刃刀等），相伴的其他类别的随葬品也稍丰厚或精致，说明有手工业技术特长的成员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但总体看，墓葬间的贫富差别仍不很大。M52中出土大型石钺和带成组刻画符号的陶罐，墓主人被认为是拥有权力和地位的特殊人物。即便是此墓，其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墓地中仍属一般，表明自兴隆洼文化以来辽西区古代社会以礼仪别地位的传统依然存在。

小河沿文化阶段不仅未见遗址大规模结群的现象，也未发现地位突出的中心性聚落或类似红山文化那样的祭祀礼仪中心，社会政治组织的演进似乎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五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出现了谜一般的起伏变化？实在值得人们去深思。综合以往的研究来看，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交织着人地关系的互动。

从地理环境来看，辽西区有着复杂多样的地貌、土壤和植被类型，日照和降水也比较充足，具备为多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提供理想生态环境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沙性黄土分布广泛，年降水量又过于集中（80%的年降水量集中于夏季），经营不当易造成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从而显示出生态上的脆弱性。[38—39] 辽西区地理环境的这种双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史前文化的发展。古土壤和孢粉组合的研究表明，距今8000—5000年，辽西区处于全新世以来水热条件相对比较优越的时期。[40—41] 正是在这一时期，由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原始农业得到了逐步的发展。

兴隆洼文化阶段，目前已发现人工栽培的作物颗粒 [11]，但被定为农耕工具的石锄和石铲既大又笨，形态颇为原始。此期遗址中常见马鹿、斑鹿、野猪、狗、野牛、蚌、鱼等野生动物的遗骸和胡桃楸果核 [10]，表明渔猎采集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赵宝沟文化时期，石质生产工具中出现了便于翻耕土地的石耜，并且可能开始了猪的驯养，说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遗址中见有较多的野生动物的骨骼，显示狩猎经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17] 到了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工具中用于翻耕的石耜和用于收割的石刀大量增加，而野生的鹿、狗、牛等动物的骨骼呈现了减少的趋势 [42]，表明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居于主导地位。

农业的发展，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带来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从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呈几何倍数上升即是明证。一般来说，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氏族本身规模的扩大和不断的分裂，进而造成彼此不具血缘关系的人群在近距离范围内的接触。这样，邻近的聚落出于相互联

^①原报告将这片墓地分为A、B、C三区。其中的C区实际上包含了由空白地带相隔的两部分，这两部分墓葬各自可代表一个区。整个墓地实际上可分为四区。

姻、相互提供保护或共同开发周边资源而又不引起纷争的需要，便往往选择聚合成一定规模的地域性组织。实际上正是如此，伴随人口的不断增长，由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社会组织结构得以不断的复杂化：先是于赵宝沟文化阶段形成部落这种小范围的地域性组织，至红山文化时期又进一步发展出跨地数百平方公里的部落联合体。与此相应的是，要管理和协调好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便需要不同等级的管理者。于是，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就此进入了酋邦社会。当然，在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酋邦社会中，权力阶层之所以会获得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权，主要是利用了辽西区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这种共同的信仰，通过对通神权的控制而达到的。此外，由于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先后吸收了来自中原的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因素 [43]，并出现了彩陶，所以也应考虑在其复杂化进程中中原地区所给予它的影响。但是，在红山文化的礼仪系统中始终是以当地传统的玉器作为礼神之器的 [44]，彩陶虽也使用，却是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反映出自身突出的个性。

农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口迅猛增长，带来了红山文化的繁荣，并加速了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红山文化的农业仍然是一种依靠大规模垦荒而维持的旱作农业类型。就这种粗放式的农业类型来说，假如人口的密度不大，轮流的休耕仍然会使土地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从调查来看，辽西区红山文化聚落的分布已达到了较大的密集程度，不仅每个聚落群可跨地几公里到十多公里，而且就是聚落群之间的间隔区域也并不大。从敖汉旗的情况看，聚落群之间的间隔远者 10 余公里，近者则只有 2—3 公里。 [23] 除去易受洪灾的河谷和土壤贫瘠或基岩裸露的山梁之外，每个聚落可供垦用的坡地已并不富裕，说明人口的增长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在红山文化时期已逐步显露出来。到该文化的晚期，这种趋势可能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红山文化以粗放式的农业类型来支持超限度的人口密度，势必会对辽西区的丘陵山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导致持续不断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再者，根据东北泥炭地的空间变迁和孢粉组合研究，得知距今 5000 年前后曾出现降温事件，降温幅度为 1—3⁰ C [45] 与此相伴的是，在东北西部开始经历风沙活动期，并且古土壤停止发育。 [46] 红山文化这种粗放式的、较高强度的农业活动与距今 5000 年前后开始的气候干冷化相耦合，必然导致辽西区的环境迅速向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转化，并最终导致人口的大量外流。这应是红山文化酋邦社会突然衰落的主要动因。

伴随红山文化在距今 5000 年前后的结束，辽西区的史前文化进入到了发展的低谷时期。密度较低的小河沿文化的人们只能重新以较小的群体分散龟缩于区域内水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段去维持缓慢的发展。

综上所述，辽西区的古代社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却又最终趋于衰落的一个发展过程。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得以不断的复杂化。由兴隆洼文化那种分散的村落组织，到赵宝沟文化时期流行的部落，再到红山文化时期脱颖而出的复杂酋邦，表现出持续进步的演进态势。这一切，主要是因原始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口迅猛增长而造成的。但物极必反，红山文化晚期所达到的较高的人口密度以及粗放的旱作农业类型，使得辽西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负重荷，加之距今 5000 年前后出现的气候干冷化，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交互作用，终于导致红山文化的消亡和酋邦社会的解体，社会重新开始以较低水平的组织进行运转。

[参考文献]

- [1] 张忠培. 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 (1).
- [2] 郭治中. 内蒙古东部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2 辑)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5 (10).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1992年发掘简报 [J]. 考古, 1997 (1).
- [5] 杨 虎, 刘国祥. 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再获硕果 [N]. 中国文物报, 1993-12-26
-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 [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1 辑)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 1987-1990年三次发掘 [J]. 文物, 1994 (11).
- [8] 辛 岩, 方殿春. 查海遗址 1992年-1994年发掘报告 [A]. 辽宁考古文集 [C].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 [9] 卜 工. 北首岭遗址广场墓葬的特殊含义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0 (2).
- [1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 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 2002-2003年的发掘 [J]. 考古, 2004 (7).
- [12] 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 内蒙古东部 (赤峰) 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13] 郭治中. 白音长汗发现的女神像及其崇拜性质 [A]. 青果集 [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 [14] 朝格巴图. 内蒙古巴林右旗锡木包楞出土玉器 [J]. 考古, 1996 (2).
- [15] 杨 虎, 刘国祥. 兴隆洼文化居室葬俗及相关问题探讨 [J]. 考古, 1997 (1).
- [16] 王 刚. 兴隆洼文化石雕人体像 [N]. 中国文物报, 1993-12-05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 [J]. 考古, 1987 (6).
- [19] 冈村秀典. 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 [A]. 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20] 敖汉旗博物馆. 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 (1).
- [21] 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 滦平县博物馆. 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 [J]. 文物, 1994 (3).
- [22] 周 南, 柯睿思. 对内蒙古东部、安第斯山北部和美洲中部早期酋长制社团的村落布局之比较研究 [J]. 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3
- [23] 邵国田. 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 [A]. 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 [24] 杨 虎. 敖汉旗西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 [A].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8) [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2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 1 辑)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 [26] 方殿春, 刘葆华.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 [J]. 文物, 1984 (6).
- [27] 苏布德. 洪格力图红山文化墓葬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0 (2).
- [28] 郭大顺.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 [A].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29] 苏秉琦.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 [J]. 东南文化, 1993 (1).
- [30] 苏秉琦. 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 (提纲) [A].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C].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 [31] 王立新. 试论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 [A]. 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待出版.
- [32]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 [33] Li Li. Development of chiefdom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in Neolithic China— A study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 patterns [J].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994
- [34] Colin Renfrew. Beyond a subsistence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Prehistoric Europe in Re-

- [35] Timothy K Earle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Complex Chiefdom: the Halelele District, Kauai, Hawaii Anthropological Papers Museum of Anthropology [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1978
- [36] 辽宁省博物馆, 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敖汉旗文化馆. 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 [J]. 文物, 1977 (12).
- [3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赤峰市博物馆. 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38] 宋豫秦.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沙质荒漠化过程的人地关系 [D]. 北京: 北京大学, 1995
- [39] 宋豫秦.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环境变迁 [A]. 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 [40] 武吉华, 郑新生.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赤峰市沙区) 8000年来土壤和植被演变初探 [A].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 [C].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2
- [41] 夏玉梅, 汪佩芳, 李取生, 等. 东北全新世温暖期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 [A]. 中国生存环境演变规律研究 [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3
- [42] 汤卓炜. 西拉木伦河流域史前环境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待刊.
- [43] 朱延平. 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纵横 [A]. 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 [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 [44] 郭大顺. 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 [J]. 文物, 1997 (8).
- [45] 李取生, 李崇岭. 东北泥炭发育与中全新世降温事件的初步研究 [A]. 中国生存环境演变规律研究 [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3
- [46] 裘善文, 李取生, 夏玉梅, 等. 东北西部沙地古土壤与全新世环境 [A].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 [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刘文山]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Prehistoric Societies in Complexity in Liaoxi Area

WANG Lixin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From 8000 B.P. to 5000 B.P.,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in Liaoxi Area underwent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Scattered countryside group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tribes appeared, finally chiefdoms formed. This process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afterwards speedy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later period of Hongshan Culture happens to be the peak of Prehistoric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However, overru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high intensified primitive agriculture make the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rd to take the burden. Moreover, the drop in temperature which occurred about 5000 years ago, finally make the people move to other areas and the chiefdoms collapse. Once again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keep going in form of lower leve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Liaoxi Area; Prehistoric Society;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